

## 五十七

我是从北边的房县进入神农架的，如今盛传野人出没之地。据清末的《郧阳府志》记载，这南北八百里的林区，当年「林虎画啸，野狸时啼」，足见蛮荒。我并非调查野人而来，实在想看看这片原始森林是否还在。我也并非怀着那种未曾泯灭的使命感，它压迫我，令我活得十分不自在，只是想既然已经从长江上游的高原和大山里一路下来，中游这一片山区不能漏了不看。没有目的便是目的，搜寻这行为自成一种目标，且不管搜寻什么。而生命本身原本又没有目的，只是就这样走下去罢了。

夜间大雨滂沱，到早晨也还小雨不断。公路两边已没有像样的林木，山上只爬满了葛藤和猕猴桃，河里和溪涧都是浑黄的浊流。我上午十一点到了县城，去林业局招待所想找进林区的便车，碰上正在召开三级干部会。我弄不清是哪三级，总归同木材有关。

中午会议上聚餐，听说我是从北京来的作家，负责张罗的一位科长便拉我一起进餐，还安排了下午要出车的一名司机坐在我边上，一味劝酒。

没有作家不会喝酒的！”这科长长得圆实，人满豪爽。

大碗大碗烫热的米酒很好进口，人人酒性焕发，面泛红光。我不能扫兴。也跟着豪饮。一顿酒饭下来，我头晕乎乎的，那司机也不能出车了。

开会的人下午继续开会，司机则领我推开一间客房，各人找个铺，倒下一觉睡到了傍晚。

晚餐还有剩菜剩酒，干脆再醉。我只得在招待所过夜了。司机来说，山水把道路冲坏了，明天能不能出车还很难说。好在休养生息，他也乐得。

晚上，这科长来同我聊天，他想打听首都宴会上都吃些什么？先上什么菜？后上什么菜？说是去过北京故宫看过的人回来说，给慈禧太后做一顿饭得杀掉一百只鸭子，问可是真的？毛主席老人家中南海里住的地方是否还开放参观？电视里播放的那打补丁的睡衣我见过没有？我借此也问问他这里的掌故。

他说解放前这里没有多少人，伐木的南河有一家，斗河有一家，放到大河时才扎排，全年木才外销量不一百五十立方米。从这里到神农架，一路上只有三户人家。一直到六〇年以前，森林基本上未遭到破坏。之后通了公路，情况就不一样啦，现今每年要上交五万立方米木材，生产发展了，人也来多了。原先每年第一次春雷，山洞里就出鱼，用竹匾堵在洞口水流上，一接一箩筐，现在是鱼都吃不到了。

我又问这县城的历史。他脱了鞋，盘腿坐上床说：

“要讲历史嘛，可就古老啦，离这里不远，他们来考古的在山洞里还发现了古猴人的牙齿！”他见我对古猴兴趣不大，又讲起野人。

“这东西要碰上了，他会抓住你肩膀直摇，弄得你晕头转向，他哈哈大笑，转身倒走了。”我觉得他这像是从古书上看来。

“你见到过野人吗？”我问。

“还是不见到的好。这东西比人高，一般总有两米多，一身红毛，一身红毛，披着长头发，这么说说不要紧，真见到可吓人呢。不过，他轻易不害人，只要你不伤他，还会咿咿呀呀讲话，特别见到女人，咧嘴就笑。”

这都是他听来的，恐怕也讲了几千年了，他讲的又不很新鲜，只好打断他：

“你们职工中有没有见到的？我不是说农民或山里老乡，我是说你们林区的干部工人中，有见到过的吗？”

“怎么没有？松柏镇革委会主任，他一起好几个人坐的一辆小吉普，就在公路上叫野人截住，当时全傻了，眼看他一摇一摆走了。都是我们林区的干部，我们都认识，都玩得来的。”

“革命委员会这也是好多年前的事的，最近有人见到过没有？”

“来考查野人的多的是，现在每年好几百，全国各地都有人来，中央科学院的，上海的大学老师，还有部队的政委、去年从香港还来了两个，一个商人，一个是消防队员，我们没让他们进去。”

“有见到过野人的？”

“怎么没有？我说的野人考察队的这政委是个军人，同车还带了两名警卫员。也是下了一夜的大雨，路面冲坏了，第二天又是大雾，就迎面碰上啦！”

“没抓着？”

“车灯的能见度只有两三米远，等他们提枪赶下车这东西就跑掉了。”

我摇摇头，表示惋惜。

“新近还专门成立了一个野人学会，地区党委早先的宣传部长亲自挂帅，他们掌握有野人的脚印的照片，野人毛和头发。”

“这我倒见过，”我说，「我看过一个展览，恐怕就是这野人学会举办的。也见到过展出的野人脚印的放大照片，他们还出了一本有关野人的资料，从古书上对野人的记载到国外对雪人和大脚怪的报道，还有好些对目击者的调查报告，」我一一表示认可。「我还见到一张地方报纸上登了一只砍下的野人脚掌的照片。」

“什么样的？”他弯腰冲我问。

“像一只风干了的熊掌。”

“那不对，”他摇摇头，「熊掌是熊掌，野人脚掌比熊掌要长，同人的脚板差不多。我为什么先头对你讲那猴人的牙齿呢？照我看，这野人就是还没有进化成人的猿人！你说呢？」

“那也没准，”我说，打了个哈欠，都是那米酒的缘故。

他松下劲来，也打了个哈欠，会议上整天忙碌聚餐够他累的了。

第二天他们还继续开会。司机来说路没修好，我也得再歇一天。我又找到这位科长，说：

“你们开会都很忙，免得打扰。有没有哪位退休的干部了解这县城历史？我好同他聊聊去。”他想起了一个劳改释放回来的前国民党时代代理过县长的，说：

“这老头子什么都知道，也算是个知识分子。县委新成立的县志编写小组总找他调查核实材料。”

我在一条阴湿泥泞的小巷里，挨门挨户果真问到了他家。

这是个目光敏锐的瘦老头，请我在他堂屋里坐下，不停咳嗽，一会让茶，一会请我吃瓜子，看得出他满腹疑虑，不明白我的底细。

我说我想写一部历史小说，同现今毫无关系，特来拜访请教。他这才释然，不咳嗽了，手也不动这动那，点起一支烟，挺直腰杆，靠在硬木椅背上，竟也侃侃而谈。

“这里西周属于彭国，春秋时属于楚国；到了战国时代，成为秦楚必争之地。战祸一起，杀人如麻，历史尽管久远，却一直地广人稀、满人入关后，全县三千多人丁，杀得只剩下十分之一。再说，元代红巾军起事以来，这里土匪就不断。”

我弄不清他是否把红巾军也算做土匪。

“明末李自成，一直到清康熙二年，他的势力才被消灭。嘉庆元年，这里全是白莲教。张献忠和捻军也攻占过。再有是太平军，到了民国时期，官匪、土匪、兵匪，都很多。”

“那么这里一直是土匪窝？”我问。

他笑了一笑，也不作答。

“一到太平年景，这里外迁来的，土生土长的，人丁又兴旺起来，也还繁荣。史书记载，周平王曾在这里采风，也就是说公元前七百多年前，这里民歌就很盛行。”

“那就太古老了，”我说，“能不能请你讲讲你亲自经历过的事情？比方说，民国年间，这官匪、土匪、兵匪怎么个闹法？”

“官匪，我可举一例，一个师两千来人变，奸淫妇女就好几百，还拉了二百多人做叶子，有大人也有小孩，这叶子是土匪的黑话，也就是肉票，要枪枝、弹药、布匹、手电来赎人，一个人头动辄一两千银元，限期交到。得雇人用箩筐挑到指定的地点，有家人送到晚了半天，连绑去的小孩子也照样撕票，只赎回了一只耳朵。至于小土匪闹，无非杀个把人，抢了钱财就跑。”

“那太平盛世呢？你是否见过？”我问。

“太平盛世……”他想了想，点了点头，“也有，那年景赶三月三的庙会，这县城里有九个戏台，全雕梁画栋，十几个戏班子，白天、夜里连轴转。辛亥革命之后，民国五年，这县城里的学堂也有男女同校，还开过盛大的运动会，女子运动员穿短裤赛跑。到民国二十六年以后，民风又是一变，每年初一到十六，十字街上赌桌摆上好几十，一个大地主一夜输掉了一百零八个土地庙，你就算算多少田地和山林！妓院就有二十多家，不挂牌子，实际以此为业，远近几百里地的都来，昼夜接客。然后将、冯、阎三家军阀大战，抗战时日本人又大破坏一次。再就是帮会势力，人政府接管之前到了高潮，当时城关镇八百多人，青帮占了四百，势力渗透到上层，县政府的秘书都参加进去，下层到贫苦人家，抢亲、盗窃、卖寡妇，干什么的都有。当小偷也要拜老五。大户人家婚丧，门口成百的乞丐，要不找到叫花头子老五买个人情，有枪杆都压不住。青帮多是二十来岁的青年，红帮年龄大些，土匪头子以红帮为主。”

“这帮会中人可有什么暗号，彼此沟通？”我来了兴趣。

“青帮是在家姓李，外出姓潘，见面都称兄弟，叫做口不离潘，手不离三。”他把拇指和食指一环，张开其他三指，做了个手势。“手势是个暗示，彼此口称老五，老九，女的叫四

姐，七姐。辈分不一样的以父了相称，师父，师母。红帮彼此称大爷，青帮称大哥。只要茶馆里坐下把帽沿翻过来一搁，只管喝茶抽烟，自有人付帐。”

“你是否也入过帮派，”我小心翼翼问。

他微微一笑，呷了口茶。

“那年月要没点关系，代县长也不会做的。”他又摇了摇头，“都是以前的事啦。”

“你是不是认为文革的派别也有点这样！”

“那是革命同志之间，不好类比。”他断然驳回。

一时冷场无话。他站起来，又开始张罗我吃瓜子喝茶，一边说：

“政府待我不错，要不关在牢里，我这罪人碰上那群众运动，也不一定活得到今天。”

“太平盛世不可多得呀，”我说。

“现今就是！这不都国泰民安？”他谨慎探问我。

“有饭吃，还可以喝酒。”

“那还图什么呢？”他问。

“可不，”我应答道。

“容我读书才是福，见人多事始知闲，”他望着天井说。

天上又下起细雨来了。